

萨尔浒之战的启示

□ 张剑锋

萨尔浒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这一战中，六七万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以各个击破的战术，将分四路而来的近10万明军（含13000朝鲜军，2000叶赫军）一一击破。其中杜松、马林、刘綎三路军队均全军覆没，李如柏军侥幸逃脱，但在溃退过程中也损失惨重。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文武官吏死亡300余人，兵丁死亡45800余人，而后金军损失据估计不超过5000人。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萨尔浒之战历来被看作是各个击破战术的范例，努尔哈赤在此战中的名言“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更成了后世兵家常引用的对各个击破战术的标准注解。这种说法，乍一看很有道理，努尔哈赤似乎也确实是这样取胜的。但仔细一想，问题却绝不会这么简单。如果兵力越集中越好，那所有人打仗都应该把兵力猬集一处，怎么还会存在分路出击的战术？难道努尔哈赤自己打仗就从来不分兵？当努尔哈赤利用其局部优势痛击某路明军时，是什么力量使得其他各路明军没有利用他们的优势把后金的整个后方全部扫荡光？可见，帮助努尔哈赤取得胜利的，绝不仅仅是一个集中兵力的常识，而是另有其他的关键因素。

在许多军事历史作品中，对于此战都有详细的论述。对于明军惨败、



后金军大胜的原因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多数说法都有道理，但是还不够全面。本文想讨论的，就是常常被论者所忽视的一条：后金军的机动性要远远超过明军。虽然这一点在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起眼，但如果没有这一点，努尔哈赤各个击破的战术很可能就无法使用，或者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

一动一静形成的巨大差距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萨尔浒之战双方的日程表。杜松军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月29日（农历，下同）出抚顺关，3月1日进抵萨尔浒，杜松遂将本部25000人分作两批，自引万人进攻吉林崖的界凡城，剩下的兵马守备萨尔浒大营。此时，后金军主力已至萨尔浒不远处。努尔哈赤令代善、皇太极指挥2旗兵增援吉林崖，自己

亲自统领剩下的6旗兵进攻萨尔浒明军大营（这下努尔哈赤自己也分兵两路了）。两军于3月2日展开激战，战至下午，后金军主力攻破萨尔浒明军大营，歼灭守营明军。接着，努尔哈赤移兵吉林崖，以8旗全力围攻杜松，至当晚将杜松军全歼。

此时，马林军已经进至距萨尔浒约40里的高间崖，听到杜松军覆灭的消息，不敢再前进，遂将部队分别驻扎在高间崖、飞芬山和韩琿鄂三处，各相距数里，形成犄角之势。后金军连夜行动，于3月3日晨向马林军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后金军连破明军3寨，全歼马林军。

刘綎军于2月25日出发，由于路途较远，道路崎岖，部队机动力差，2月29日才到牛毛寨，至3月2日方过深河。由于刘綎没收到杜松、马林两军覆灭的消息，也没接到明军统帅辽东经略杨镐让他撤军的命令，因此仍然孤军前进。努尔哈赤派人假扮杜松军使者，催促刘綎前进。刘綎不知是

计，于3月4日前进至距赫图阿拉约50里的阿布达里冈时突然遭到后金军全军伏击，结果全军覆没。后金军进而迫降了由元帅姜弘立、副帅金景瑞指挥的朝鲜军13000人。李如柏军自3月1日出鸦鹘关后进军速度极慢，一闻诸路兵败的消息后掉头就跑。后金军20余人在李如柏军后大声鼓噪，佯装大军来攻，李如柏军全军溃散，一路上自相践踏，死伤数千。

仔细研究一下双方的日程表，我们不难发现明军与后金军之间存在极大的机动能力差距。马林军于2月28日出铁岭三岔口，3月2日才走了大约50里路，到达高间崖，平均每天仅走10里多一点。刘綎军2月29日抵达牛毛寨，到3月2日才到达深河，而深河与牛毛寨间隔60里，则行军速度也只有每天20里左右。李如柏军行动更慢，3月1日出鸦鹘关，数日后至虎兰岗，才前进不到20里。就是号称“抢功冒进”的杜松军，2月29日出抚顺关，3月1日才前进约50里至萨尔浒，行军速度也不过一日20多里。

而反观后金军，其行军路线是，先由赫图阿拉西行160里至萨尔浒击败杜松，当日作战又行军30里。当夜机动约40里至高间崖，次日又击败了马林军。而后，后金军再回师180里到赫图阿拉，又马不停蹄向南前进50里至阿布达里冈击败刘綎军。从3月2日到4日这不到3天时间里，后金军就机动了300里，平均每天行程在100里以上。可见，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的战术机动速度，是以步兵为主的明军的5倍以上。

正是机动性上的极度不对称，给了努尔哈赤以集中优势兵力将明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如果有一幅描绘萨尔

浒之战的动态图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两幅反差极大的图景。在不到3天的战役过程中，明军几乎是呈一种静态布置，各路的位置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而后金军则在几路明军之间来往奔驰，连续3战都是以几乎全部兵力对明军的1/4。这一动一静最后形成的效果就相当于后金军兵力平添了2倍。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明军具备与后金军相似的机动力，而其他一切部署均不变，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如果明军一开始就具备与后金军相同的机动力，那么杜松马林两军就可以于3月1日甚至更早就在抚顺关与萨尔浒之间的某地会师。此时如果努尔哈赤再想各个击破，那他面临的就不是25万人而是45万人。以45万人对后金军6万，明军未必就会立刻败下阵来，最起码也可以多拖一段时间。而此时，李如柏军和刘綎军早就兵临赫图阿拉，使后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

灵活调整策略

当然，在萨尔浒之战中也存在其他方面的不对称性。譬如信息上的不对称，明军还未出师，其作战计划就为后金间谍所获。此后，四路明军的进展情况时时刻刻都在后金军监视之下，正是如此，努尔哈赤才得以采用如此大胆的作战计划。而与此同时，明军对后金军却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各路之间的联络也非常不畅，直到3月4日，杜松、马林两军已经被歼灭之后，刘綎军还蒙在鼓里，以为一切顺利，继续放心大胆地向赫图阿拉前进。但是，在这一战中，信息不对称

魏才秦用

□ 崔庆

春秋时期，有“楚才晋用”的典故，说的是楚国朝纲不振，优秀人才投奔他国，特别是被晋国重用。其实，更加令人感叹的是“魏才秦用”。战国时期，商鞅、张仪、范雎都来自于魏国，相继入秦，帮助秦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魏失三才

魏国在战国时代最先崛起，曾是天下英才向往之地。魏文侯治下，群贤毕至，以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为师，以李悝、翟璜为相，以乐羊、吴起为将，文武并进，开创霸业。但魏惠文王沉溺虚名，察举不明，举措失当，人才流失，国势日下。

商鞅生于卫国，在魏国工作多年，算是大半个魏国人。公叔座身为魏相，深知商鞅之才，却未重用，在临死之前才劝说魏惠王对其委以重任，并建议如不用之必除之。虽然魏王不以为意，但商鞅在职场失意和生命威胁的双重打击下，响应秦孝公《求贤令》的“集约号”，西行入秦。

张仪本为魏国贵胄之后，辗转各国，不为所用，却在秦国找到了新天地，被委以重任，成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位相国。范雎和张仪同病相怜，身负奇

才，却在魏国无立锥之地，受中大夫须贾、魏相轸齐的迫害，心死投秦。失意之人百折千回之后都投奔秦国，绝非偶然，秦国海纳百川，引天下之士，初现鹰隼试翼之态。

兴秦三策

魏国弃如草芥，秦国得之如宝，求贤若渴，用才不疑。秦孝公的求贤令慷慨激昂，“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六国之士怎能不血脉贲张。商鞅、张仪、范雎入秦之前，都曾命悬一线，在秦国却登上殿堂，与国君坐而论道，指点江山，施展胸中抱负。

后世泰国重臣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于“魏才秦用”有精辟的论述。孝公商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富国强。惠王纳张仪之计，拔三川，并巴蜀，收上郡，取汉中，散六国之众。昭王宏范雎之略，废勋贵，强公室，远交近攻，蚕食诸侯。百余年间，三位来自魏国的杰出战略构架师前后接力，打开了泰国强势崛起的空间。

商鞅献固本之策，编什伍之民，兴农战之法，立国之威信，逐步取得了河西之地的控制权，扭转了秦国长期受魏国压制的局势。张仪献离散之策，巧舌如簧、长袖善舞，疲楚弱楚，破魏楚、齐楚之盟，在秦、楚、齐鼎立格局中赢得先机。范雎献蚕食之策，远交近攻、虎视三晋，连击韩国，以有上党，“得寸则有寸，得尺亦有尺”。魏失三才，皆成秦之栋梁，献兴秦三策，皆中治国肯綮。

唯才是举

秦用函谷雄关挡住了六国之师，但对于六国人才却敞开大门。随着战国竞争不断加剧，秦国对于人才的需求已经不能满足于“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广揽各国人才。最迟至昭襄王中后期，秦国已经建立起组织严密的“猎头”网络，开展搜罗六国人才的专项工作，范雎入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秦国使者王稽发现范雎，看似是一件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但仔细分析，却是必然结果。王稽表面上是秦王派遣出访魏国的“谒者”，实际暗中执行招募人才的重大任务。在魏国期间，他时刻高度关注“魏有贤人可召供西游者乎”，利用每一个机会打探情况。王稽具备职业“猎头”的一切素质，眼光独到，第一次和范雎相见，“语未究，知

唯贤”。王稽如获至宝，怕夜长梦多，迅速向魏王辞行，带着范雎一同归秦。

王稽不是昭襄王唯一的特使，泰国的“猎头网络”深入到六国之中，成为一个系统工程：老幼不问，文武全收，唯才是举。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人才流量为秦国带来了发展质量。

客卿之力

泰国有什么魔力，能吸引六国之士？是有高薪，是有豪宅，还是给咸阳户口？或许都有，但都不是关键因素。泰国的“撒手锏”是让人才感受到被充分尊重，找到施展平生抱负的平台。刘玄德三顾茅庐，请出孔明隆中对；昭襄王五跪请贤，得到范雎兴秦策，都可谓旷古美谈。秦国从惠文王时代开始，逐步建立完善客卿制度，虽然曾因郢国渠事件短暂地徘徊，但从整体趋势看，始终保持着高度开放的态度，整个国家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创业平台，空间巨大、机会开放、规则明确、赏罚分明，能者趋之若鹜。

从秦惠文王至秦始皇的一百余年间，不仅魏才为秦所用，六国贤良皆以入秦为时尚。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楼缓，魏国张仪、范雎，燕国蔡泽都曾担任过泰的相国；客卿金受、寿烛、杜仓、胡伤，或文或武，都曾为秦效力。卫国青年胡伤数年之内由客卿升任中更、成为统率精兵的实权将领，张仪、甘茂实现了出入将入相的梦想，这些无疑都有巨大的广告效应。据学者考证，自秦惠文王时代起，有超过半数的秦相来自泰国之外。

秦国把客卿制度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关中虽是泰土，却成为天下英才的共同舞台。多少六国之士怀抱火热之心，把泰国崛起当作自己的事业，报效泰国成为最大的奋斗目标。客卿助秦，外拓疆土，内强君权，平衡公族，为泰国塑造中央政府权威夯实了基础。

“魏才秦用”不过冰山一角，但已可知泰包含宇内之心。秦志在高远，容人之短，用人之长，聚天下之才，皆为可用之人。秦法严明，有功者上，有失者下。大时代风云激荡，秦胜终六国，有赖于虎狼之师，更倚重天下有才之士。



历经千年的正定古塔

□ 赵 威

千百年来，三国戏之流行，无出其右者。一句“吾乃常山赵子龙也”，宛如响箭，穿透历史烟幕，回荡在一代代戏迷耳畔。若追问，赵子龙乃常山何地人也？恐怕就少有人知了。正定的低调或许从赵子龙时代就开始了。正定，在汉代是常山郡的驻地，称作“真定”。地如其名，正定是一座真正安定的城。

历史的车轮滚过中山国、恒山郡、常山郡、真定府，今天的正定古城仍然低调，不失本色。

登阳和楼北望古城，四塔尽收眼底。体量最大者，乃天宁寺凌霄塔。明嘉靖《重修天宁寺木塔记》载：“我真定世系累朝之巨镇，亦有天宁久为天下之名山，中有一塔，俗以木名，创始大唐，规模浩浩，下压鸿庞，形势巍巍，上凌霄汉。”“凌霄塔”由此得名。

来到天宁寺，笔者先是被门口两尊石狮子吸引，它们既没有汉唐石狮的勇猛神异，也不像程式化的明清石狮那样敦厚驯服，而是瘦瘦的身躯，歪着脑袋，憨态可掬。见到它们，即便再糟糕的心情也会通至九霄。早在1934年，德国女摄影师莫理逊就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对石狮的可爱形象。

迈过山门，及至塔前，恍惚间时空倒溯至千年前：

凌霄塔下，众工匠围着一名僧人，辩论正酣。细听，所辩非佛法义理，也非风动还是心动的玄虚之学，而是土木工程的讨论——如何换掉支撑这座宝塔里的通天大柱。大柱年久朽烂，塔身向西北倾斜，日益倾危。许多年来，真定周边的能工巧匠对此束手无策。单看这凌霄塔里的通天柱，由九根圆木合抱组成，立在四层塔心，平伸出八根木梁，像雨伞的骨架一样呈放射状，由此以上，层层架设，榫卯相接，与塔身咬合为一体。这位天仓饱满、眉目清秀的僧人，在讨论之后离开众人，度量塔身长短。之后，另作别柱，令人将其吊装上塔，随后，屏退众人，只身走进塔

身。闭门良久，未闻一凿一斧之声。待到他出来之时，通天柱已换成新柱。顷刻，喜讯不胫而走，人们从四面八方奔来，庆祝这一偷梁换柱的工程奇迹，塔下欢舞沸腾。

这位僧人名叫怀丙，是真定本地人。当代人与他相识不是在修塔时的北宋，而是在千年后的小学课本里——是他从黄河中用浮船法打捞出八只大铁牛。

物之少则为奇。华夏大地上留存至今的古塔，数也数不清，以塔心柱为重心支撑的木塔却仅此一例。欲寻其相同建式，只能东渡日本，那里的寺塔深受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影响，建于飞鸟时代的法隆寺五重塔，和天宁寺凌霄塔的结构相仿。这类以塔心柱为支撑的木塔，是中国南北朝之前的建塔模式，只是，木塔极易受到损坏，火灾是它的致命威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历史上兴佛与灭佛交替进行，木塔也容易被人为破坏。也因此，凌霄塔的价值不言而喻。

一座塔就是一段历史、一首传奇。凌霄塔的历史给今人的文保理念以有益启迪。严格意义上讲，凌霄塔是砖木混合结构，下四层与上五层迥然有别，建于不同年代。单从外观看，夯土筑底有唐塔遗风，一至四层的八面体有宋代气象，四层以上的密檐式各层便是辽金风格，千百年的历史文化凝缩于凌霄塔一身。令人感到庆幸的是，无论谁来重修都没有推倒重来，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格，在凌霄塔身上结合得完美无限。

出天宁寺左转至燕赵大街，往南看，分布着另外三座塔。最近的一座古塔便是开元寺须弥塔，俗称“雁塔”。来到开元寺，大地在此沉降，整座院落比四周矮了数米，拾级而下，仿若进入历史的隧道，每走一步都像时光倒流，穿越回到了大唐盛世开元年间。早在80多年前，梁思成就断定须弥塔最初是一座唐塔，2005年整修时，在塔尖发现的铭文印证了梁先生的推断：“真定府开元寺旧有宝塔一座，自大唐

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机动性的不对称。我们假设战斗打响之后明军就全部获悉了敌人和友军的所有信息，战局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杜松军覆灭的命运仍然无法挽回。同样，马林军也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与其在运动中被后金军追上屠杀，还不如就地固守。唯一可能发生变化的是刘綎军的命运，假如刘綎在3月2日就全速撤退的话，也许可以脱险。整个战役明军的损失可能会由45000人下降到30000人，但大败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总的来说，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成功地利用了双方机动性上的不对称，以各个击破的战术，击败了兵力占优势的明军。努尔哈赤正确果敢的军事指挥固然是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双方一动一静的悬殊差距，简单的“我只一路去”，也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如果来的不是行动迟缓的明军步兵而是同样快速机动的蒙古骑兵的话，这种“顾头不顾腚”的打法甚至很可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事实上，努尔哈赤自己也没有机械地执行“我只一路去”的打法，在与杜松军的战斗中，就分兵两路去攻击明军萨尔浒大营和支援界凡城，因为此时明军已经开始攻打界凡城，双方机动性的差距已不存在。如果努尔哈赤还是“一路去”的话，说不定萨尔浒大营还没攻下来，界凡城就丢了，反而陷后金军于腹背受敌之境。这说明努尔哈赤绝不是简单的理论家，而是充分了解支撑他“我只一路去”理论的具体因素和内在逻辑，因而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策略的真正的军事家。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当我们在进行决策时，如果不去考虑在理论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具体因素，而不顾客观条件、简单地生搬硬套理论，就难免会犯下按图索骥、纸上谈兵的错误，遭到惨痛的损失。



贞观拾年肆月初捌日建立，迄清朝壹千叁百余年，于顺治拾捌年柒月貳拾貳辰时倒。坐有僧大造化名自成等同化重建。”现存古塔是清代时根据唐代造像所建。

须弥塔的身世是古塔的一个缩影，建了，倒掉，再建……“须弥”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名山，在佛教宇宙观中位于世界中心，一花一叶的微观世界皆藏有须弥禅理。须弥塔的底层四面各有两个浮雕力士，形神毕肖；正门面楣上端的石额嵌着“须弥峭立”四个大字。须弥塔曾经三面环水、碧波青莲，须弥塔倒映水中，十分清静。这座镜鉴了朝代更迭的千年古塔，既是凝固的时间，又像“不舍昼夜”的岁月之河，早已物化为人类对生命永恒的追求。或许，对生命的感悟才是塔的真谛。

同样，四塔中的临济寺塔，把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发挥到了极致。临济宗是禅宗“一花开五叶”的“五叶”之一，临济寺塔便是临济宗的祖庭。

古城最南边的华塔则与其他三塔有不一样的风华，若用一个字形容，就是“艳”。它的华美曾惊艳了梁思成，梁先生发出“国内宝塔之孤例”的感叹。华塔亦称“花塔”，整座塔身如同一束巨大的花束，塔身中部一圈排列参差的浮雕变化有致，富丽堂皇。根据出土文物记载，华塔建于宋代之前，在宋代初年，见证了著名的辽宋高粱河之战，宋军从这里集结北进，最后大败而归。

到正定看塔，看到这些砖瓦木石组成的文化符号，无声地叙说着历史沧桑，无不给人以震撼的历史思绪。李太白言道：“以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天地之间，哪怕百代的光阴都将成为过客。然而，人生天地间，也应当如塔般站立，生如芥子有须弥，心似微尘藏大千。